

样板戏年代的荒诞事

◎师永刚 张凡



1963年，当时的文化部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剧团编演现代题材京剧，准备参加全国汇演。而“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行，把京剧编演现代戏的活动推向一个高潮，有37个剧目参演，演出历时37天，共218场，接待观众近33万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都观看了演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在此次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刊登在中国各大报纸的显著位置。

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亲临现场观看《智取威虎山》，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则发表社论，号召“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一时间，全中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成立了样板戏的宣传队，有条件演全场就演全场，不能演全场就演片段，连片段也演不了就清唱。收音机一打开都是样板戏，所有的舞台都是样板戏的天下，而其他戏都处于停演的状态。“京剧样板戏”全民大普及的程度可以说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正如后来民谚所说的“八亿人民八出戏”，形成了一种罕见的政治文化现象。

为了样板戏的演出的“完整”性和“标准化”，出于对众多地方演出团体的复制水平

的担忧，于是由国家出面，为每一台样板戏出版了一部内容极其详尽的供复制演出需要的样板戏演出本。这是一本类似教科书的演出说明书，发行到全国以供人们学习表演，有的甚至厚达400多页。在国家机器的干预下，这些书的发行量都非常巨大。

“不走样”的要求成了艺术桎梏

如此慎重其事，学演样板戏的第一个要求自然就是“不走样”。上海越剧院排演《龙江颂》时，中央文革指示：“词儿一个也不能改，调度一点也不能动，就是唱腔用越剧的，其他都要按京剧原样来演。”有了“不走样”和“按京剧原样来演”，各地方剧种不得不违背自身的剧种特点，使地方戏难以发挥自己的唱腔特点，甚至有的变得不伦不类。

在“不走样”的艺术桎梏下，排演“样板戏”的演职员人人自危，生怕在哪个环节上，一不留神儿出现差池而招来祸端。比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补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的李铁梅的上衣，必须完全

一样，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

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时，开演前主要演员（绝不要反面人物）一律着戏装站在台上，手捧《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和观众一起唱《东方红》，唱毕才开戏。戏结束时，主要演员又带妆站在台上，在强烈的音乐伴奏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反复唱、直至目送观众退场毕，演员才退回后台卸妆。这种做法影响到全国。当时石家庄演“样板戏”时，也大都这样做，很多时候演员不仅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目送观众退场；有时还手拉手把观众送出场外，然后才回去卸妆。各地方于是依样画葫芦，从此每出样板戏都有此类幕前演出。

无论是排演“样板戏”，还是移植“样板戏”，因稍有不敬的言论或“走了样”的舞台演出而被扣上“反对‘样板戏’”罪名的情况，多有所见所闻。例如，松江曲艺团说沪书的艺人洪富江，在演说沪书《智取威虎山》时按说书的惯例，增添了一些“噱头”。如：“杨子荣肩膀阔，胸部厚，耳朵大，生得一双虎目”，“座山雕的门槛精到九十六，杨子荣门槛精到九十七，这叫‘棋高一着’”。“杨子荣跨上青鬃马，连打三鞭，这叫拍马三（意即拍马屁）”，洪富江这样添油加醋讲故事，听众哈哈大笑。但后被定为“严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押到全县各社队和上海市区轮番批斗，3个月内大小批斗会达200余次。

另一起案件中，上海南市区红卫沪曲艺队演员施春年，也是在当地一次干部大会上说沪书《杨子荣打虎上山》，他在“飞马比双枪”中加了些“噱头”，如“八大金刚枪法百发百中，杨子荣百发不中，且慢，杨子荣打了一百另五发，中了一百另五发。”等等，也被定为“破坏革命样板戏”遭到批斗、关押。

学演者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甚至到了精神过敏的地步。有一个真实的经历是这样的：1974年，河北省艺术学校京剧班师生排演了第二批“样板戏”中的《杜鹃山》第四场“青竹吐翠”，剧本中关于这一场的布景提示是：“新竹泛绿，青翠欲滴；杜鹃盛开，绚

丽多彩……”舞台队一位极细心的老教师，因多次观摩过“样板戏”，记下了舞台上的许多细节，这次演出她回忆起“样板戏”《杜鹃山》布景上的杜鹃花是54朵，生怕学演的《杜鹃山》“走样”，开演前她就急匆匆地在台上一朵一朵地数，看是不是54朵。数的结果是54朵，才长长吁了一口气。

还有一些学演的经历则在百姓中成为流传甚广的经典笑话了。如说某剧团演《智取威虎山》时，第六场“打进匪窟”，剧本规定是一座山雕：“脸红什么？”杨子荣：“精神焕发。”座山雕：“怎么又黄啦？”杨子荣：“防冷涂的蜡。”扮演杨子荣的演员可能由于太紧张，这段对话的台词变成了——座山雕：“脸红什么？”杨子荣：“防冷涂的蜡。”座山雕一时没反应过来，照问不误：“怎么又黄啦？”扮演杨子荣的演员一听，第一句说错了，又不能收回，遂改口现编词儿：“又涂了一层蜡！”

下面这个也是样板戏学演的经典笑话：杨子荣打虎上山，在威虎厅和座山雕比试枪法：打吊灯。座山雕一枪打灭一盏油灯，众匪徒叫道，好！杨子荣振臂一甩，一枪打灭两盏灯，众匪徒又叫道，好，一枪打俩。话说有一回，某地区文工团演出这一场，座山雕一枪出去，道具一不小心关了两盏灯，众匪徒叫道：好哇，一枪打俩。道具一听着急了，英雄人物可不能输给个座山雕，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再等到杨子荣振臂一甩时，把个总电闸给关了。结果众匪徒也不含糊，齐嚷道：好哇，一枪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江青办起了“样板团”

为了让“样板戏”不走样，建立“样板团”就势在必行。1970年，江青想办一座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那样的艺术大学，为她的“样板团”输送后备力量。决定将音乐、戏曲、舞蹈、电影的教学都集中起来，既要学艺，又要劳动，名称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

这所学校选在了京郊的朱辛庄，将原有楼房格局，改建成为舞蹈排练厅、表演教室，

又在果园旁新修了十多间单人琴房，准备音乐学院把钢琴从城里搬来。还兴建了两座电影摄影棚，让电影学院学生在此实习。四所艺术院校——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校和北京电影学院——奉命迁址，来到朱辛庄。

汪曾祺在回忆文章里曾写道：在江青直接领导之下创演“样板戏”的剧团变成了“样板团”。“样板团”的“战士”待遇很特殊，吃“样板饭”，香酥鸡、番茄烧牛肉、炸黄花鱼、炸油饼……每天换样。穿“样板服”，夏天、春天各一套，银灰色的确良，冬天还发一身军大衣。样板服的式样、料子、颜色都是江青亲自定的，她真有那闲工夫！

每排一个样板戏，都要形式主义地下去体验一下生活，那真是“御使出朝，地动山摇”。为排《沙家浜》，到了苏州、常熟。其实这时《沙家浜》已经在上海演出过，下去只是补一补课。到阳澄湖内芦苇荡里看了看，也就那样。剧团排练、辅导，我没什么事，就每天偷偷跑去吃糟鹅，喝百花酒。为排《红岩》，到过重庆。在渣滓洞坐过牢（这是江青的指示：要坐一坐牢），开过龙光华烈士的追悼会。假戏真做，气氛惨烈。到华蓥山演习起义那天，正好下大雨，黑夜之间，山路很不好走，随时有跌到山洞里的危险。“政委”是赵燕侠，已经用小汽车把她送上山，在一个农民家等着。这家有猫，赵燕侠怕猫，用一根竹竿不停地在地上戳。到该她下动员令宣布起义时，她说话都不成句了。这是“体验生活”么？充其量，可以说是做戏剧小品，不过这个“小品”可真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样板团”的编导下去了解情况，搜集材料，俨然是“特使”，各地领导都热情接待，亲自安排。惟恐稍有不周，就是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

样板戏成了教科书

既然“学演”都不能走样，那么对正式表演几个样板戏的专业演员和幕后创作就更

是严格要求了。由于表演者们全部精力都放在排演样板戏上，他们反复演练，几乎都到了烂熟的地步。例如当年一些主要演员在电台教唱样板戏时，无论反复唱多少遍也不会走样，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细到了每个装饰音的用法，甚至是一个颤音中波动几次都曾反复推敲过，能够做到对每段音乐的演唱、演奏，乃至每场戏的换景时间都严格到了掐秒计算和控制的地步。

所谓样板戏，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必须按照样板严格统一复制，小到戏服上补丁的大小、颜色、位置，细到舞台上每丛芦苇有几根、多长都有明确的规定。样板戏是政治宣传品中的极品，极品的标志就是把自己变成阶级斗争教科书。这本教科书为我们展示了两个壁垒森严、界限分明的阶级阵营：一方是工农兵组成的革命阵线；另一方是帝修反、国民党、地富反坏右建立的反革命同盟。这两个阵营是如此分明，以至于只从影片的颜色上就足以区别敌我——革命的一方总与红色、白色等明亮的色彩连在一起，反革命的一方永远与黑色、灰色、深青色等暗色调有缘。《红灯记》中的红灯，杜鹃山上的红花，李铁梅身上的红花袄；江水英、红嫂、吴清华的红上衣，在阶级教育展览会上，连码头工人用的杠棒也饰以红缎……再看看座山雕、毒蛇胆、龟田、南霸天、赖金福、皮德贵和白虎团的官兵们，一律黑色服装。温其久从始至终穿着黑色长衫，在叛变革命前，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摘下红袖章。而他们那些帮凶们，也总是酷爱深色服装。

当样板戏运动红及一时之际，它们也走进了中小学校的课堂，被编入语文教材。许多地方的学校，样板戏成为学生们的必修课程内容。儿童学唱样板戏，也成为文革年代对他们灌输“阶级斗争思想”最重要方式之一。一些得到表彰的少年儿童“先进典型”，其公布的事迹中，常常可以见到“学唱革命样板戏”这一条。一些地方学校更不断举行“学演革命样板戏”文艺会演。 ■

（摘自《样板戏·史记》作家出版社）